

政府干预、市场竞争与内部治理：一个结构模型

——来自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的调查证据

余耀东^{1,2} 周建^{2,1}

(1. 南开大学 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 天津 300071; 2. 南开大学 商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政府干预和市场竞争对企业的内部治理具有重要影响, 这些影响效应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两类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中有不同的表现。政府和市场除了对企业内部治理有直接影响外, 还会通过政策法规途径对其施加影响。本文的实证研究方法启示了我们界定因果变量间结构关系和影响方式的必要性; 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 中国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政府行为的改善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 政府干预 市场竞争 内部治理 结构模型

中图分类号: F **文献标识码:** A

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程度以及企业所处的行业竞争状况构成了企业进行内部治理的重要外部环境。包括政府干预和市场竞争在内的企业外部环境是内部治理机制借以发挥作用的基础, 内部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内生于其中, 没有良好的外部环境, 即使是设计了良好的内部治理机制, 其作用也可能无法得到有效发挥。因此, 探讨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发挥作用所需的政府行为和市场竞争环境及其对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转轨经济国家需要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也应当成为未来公司治理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进入21世纪以来, 以La Porta为代表的国外学者在法律体系对公司治理影响方面的跨国比较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对公司治理的看法, 促使人们把目光转移到影响公司治理的根本因素——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政府行为和市场竞争等外部环境上来, 我们也发现国内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企业外部环境这一公司治理的基础性层面问题。

1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1.1 政府行为与内部治理

我国经济当前新兴加转轨的双重特征导致政府行为对资源配置具有重要影响, 政企分开这一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还远没有在国有企业内部形成, 政府依然控制着国有企业和大部分上市公司, 这样政府就有能力将其自身目标内化到这些企业中, 从而对企业的治理结构和水平施加影响, 所以, 考察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必须关注企业背后的政府行为这一具有重要影响的环境因素。公司治理是公司治理的基础, 公司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共治理的衍生物, 研究公司治理问题必须从政府的角色及其影响入手^[1]。

在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经历了从集权到分权的政府权力配置过程, 分权的结果使得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同时地方政府竞争资源的动机也随之产生^[2]。因为监管力量和法律约束难以限制政府权力, 地方政府为了获得配股资格具有以财政补贴、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的方式支持上市公司的动机, 或为了侵占利益具有以资产评估、关联交易、资金占用的方式掏空上市公司的动机^[3]。政府控制尤其是县级和市级政府控制对公司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 但公司所处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减轻这种负面影响^[4]。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越低, 则大股东资金侵占程度越低;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集团控

股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资金侵占行为更容易受到政府对企业干预程度的影响^[5]。外部环境对国有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有显著影响,政府干预显著增加了代理成本^[6]。国有上市公司所处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越小,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低,政府干预程度成为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特殊动因^[7]。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就越低,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对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无显著影响^[8]。

纵观学者们对政府行为和公司治理关系的研究,我们发现学者们无一例外地都没有得出政府行为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产生正面积影响的结论,而更多的是产生负面消极的影响。因此,假设1: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会直接对企业内部治理产生负面影响。

1.2 市场化水平与内部治理

所谓“市场化”是对我们正在进行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进行体制转轨的一个过程。以樊纲为代表的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团队近年来一直在致力于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们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五个方面评价中国各省区的市场化相对进程,并由此生成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及各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年度排名。他们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我国正处在市场化转轨的进程中,但市场化程度在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很不平衡^[9]。自樊纲、王小鲁等从2001年起连续推出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数后,几乎所有做公司治理环境相关实证研究的学者都用其构建中国各地区公司治理环境指数,如文献[4]、[5]、[6]、[7]、[8]等。

市场化进程作为公司治理外部宏观环境的一个重要变量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水平有显著的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内生于公司所处的制度环境,市场化进程影响地方政府控制企业的经济动机,从而影响公司治理结构的安排。正如Poncet等在文献[2]中所指出的那样,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即市场化过程)中,经历了从集权到分权的政府权力配置过程,而分权化的市场化改革,造成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存在较大差别,并可能影响到所处区域企业的经营质量以及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博弈。国内已有的研究结论支持了上述观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集团控股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资金侵占行为更容易受到上市公司所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影响^[5];提高市场化进程有利于减少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6];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差异导致了各地区投资者保护有效性的差异^[10];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外部制度环境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对投资性资本竞争的加剧,使上市公司更加主动地关注投资者对公司信息沟通的需求^[11]。

根据以上对市场化程度与内部治理关系的分析,提出假设2:市场化水平(或市场竞争度)的提高对企业内部治理水平有直接的积极促进作用。

2 实证研究设计

2.1 样本及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08BJY089)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对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治理现状的调查数据。课题组成员在国家社科基金支持下,于2008年7月至2009年9月对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中小企业的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就企业公司治理的多个方面做了深入详实的调查。作者从课题组提供的1779家企业样本中剔除了在本文研究所涉及的题项上有缺失值的样本364份,采用的有效企业样本数为1415个,有效样本中按所有制形式分类,国有企业、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和三资企业样本数分别为201、1142、44和13个,占比分别为14.2%、80.7%、3.1%和0.9%。

2.2 研究变量说明

下文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内生和外生观察变量生成于课题组调查问卷的部分题项内容，见表1。

表1 观察变量一览表

观察变量题项内容陈述	受访者的评价占比 (%)				
	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	满意	比较满意	非常满意
您对企业内部运行机制受到政府部门影响满意度的评价是： (政府干预)	1	16	59	23	1
您对贵企业所在地区当前同行企业间竞争环境(包括竞争的激烈性、公平性等方面)的评价是： (市场竞争)	1	20	56	21	2
您对贵企业所在地区当前政策扶持及税收优惠的执行情况的评价是： (政策法规)	1	26	52	19	1
您对贵企业对大股东、经理层、员工的监督机制评价是： (监督)	1	8	58	31	2
您对贵企业对大股东、经理层、员工的激励机制评价是： (激励)	1	10	67	21	1
您对贵企业在重大经营战略和方针方面的决策机制评价是： (决策)	1	10	65	22	2

在内部治理(即内生潜在变量)的测量上,本文使用了三个测量指标(内生观察变量):监督、激励和决策。监督、激励和决策机制为现代公司内部治理机制解决公司治理问题提供了三个有效的途径,通过这三种机制促使代理人即经营者努力工作,降低代理成本,避免偷懒、机会主义等道德风险行为^[12]。监督机制是指企业利益相关者针对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结果、行为或决策所进行的一系列客观而及时的审核、监察与督导的行动;激励机制是关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如何分享经营成果的一种契约,用来解决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关系的动力问题,即委托人如何通过一套激励机制促使代理人采取适当的行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委托人的效用;决策机制是设计一系列激励与监督机制的目的之所在,它促使经营者努力经营,科学决策,从而实现委托人预期收益最大化。

表1列示了包括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内的全部样本企业受访者对各测试题项的评价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企业所在地区当前同行企业间竞争环境、政策扶持及税收优惠的执行情况、内部运行机制受到政府部门影响的满意度三个方面均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给出满意的评价,它们占样本总数比分别为56%、52%和59%。相比对企业治理环境测量指标的评价,受

访者对内部治理机制的评价更为乐观，分别有58%、67%和65%的企业管理者对公司的监督机制、激励机制和决策机制感到满意。

将量表中受访者对各测试题项的评价结果进行量化，非常不满意、不满意、满意、比较满意、非常满意分别赋值1、2、3、4、5，这样就得到了各观察变量的样本值和观察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表2），并以此作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样本数据输入矩阵S。

表2 观察变量Pearson相关系数（全样本）

观察变量	政府干预	市场竞争	政策法规	监督	激励	决策
政府干预	1					
市场竞争	0.404**	1				
政策法规	0.427**	0.569**	1			
监督	0.265**	0.361**	0.320**	1		
激励	0.311**	0.406**	0.380**	0.547**	1	
决策	0.334**	0.422**	0.400**	0.513**	0.637**	1
标准差	0.690	0.710	0.736	0.689	0.613	0.620
平均值	3.07	3.02	2.94	3.25	3.12	3.14
样本数	1415	1415	1415	1415	1415	1415

（**表示在1%水平上双侧t检验显著）

表2中的数据显示，除了政策法规的均值比3略小外，其他各研究变量的均值都大于3，说明了受访人员总体上对政府干预行为、市场竞争环境和企业内部治理状况感到满意。政府干预和市场竞争与监督机制、激励机制、决策机制在1%的水平上均是显著正相关的，初步表明政府行为和行业竞争环境的改善可以显著促进内部治理水平的提高，并且政府和市场具有明显的相互促进作用。同时发现，政策法规变量与政府干预和市场竞争以及内部治理（监督、激励和决策）也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因此，假设3：政府扶持和税收优惠等政策法规对企业内部治理有直接的积极影响，并且政府干预和市场竞争以政策法规为中介间接作用于企业的内部治理。

2.3 结构方程建模

2.3.1 结构方程模型概念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是当代行为与社会科学领域量化研究的重要统计方法，它融合了传统多变量统计分析中的因素分析与线性模型回归分析的统计技术，对于各种因果模型可以进行模型辨识、估计与验证。在量化研究取向的多变量统计方法中，有愈来愈多的研究者使用SEM进行各种测量模型或假设模型图的验证，SEM已逐渐成为数据分析的一门显学^[13]。然而，尽管如此，作者通过检索文献发现国内鲜有研究者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公司治理问题，本文接下来的实证研究在这方面可谓是个补充。

SEM分析本质上是一种验证性的模型分析，就是比较研究者所提的假设模型隐含的协方差矩阵 Σ 与实际输入的样本数据导出的协方差矩阵S之间的差异。SEM具有理论先验性（即SEM建模必须有理论或经验法则作为支撑）和大样本适用性（即SEM适用于大样本的统计分析）^[14]，而本文此前的文献回顾和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以及1415个大样本数，足以保证这里采用SEM建模分析的可行性。为了探讨政府和市场因素对企业内部治理的影响路径和方式，基

于已有的理论和经验，本文初步建立以下结构方程混合路径递归模型（图1），然后进行全样本和多群组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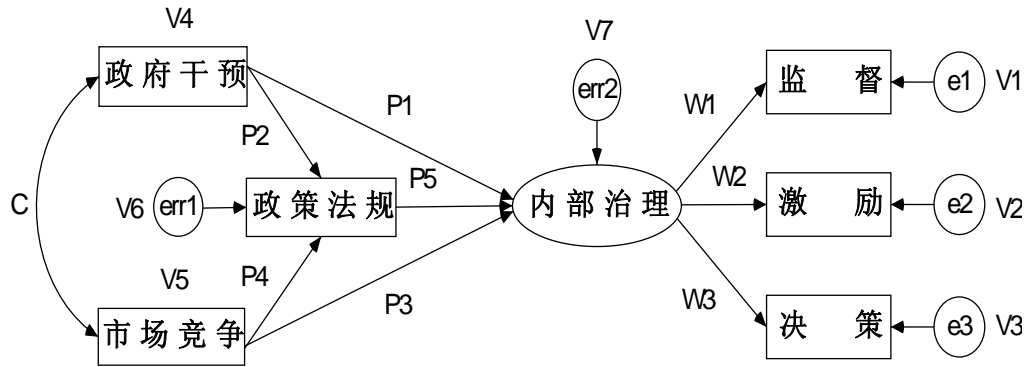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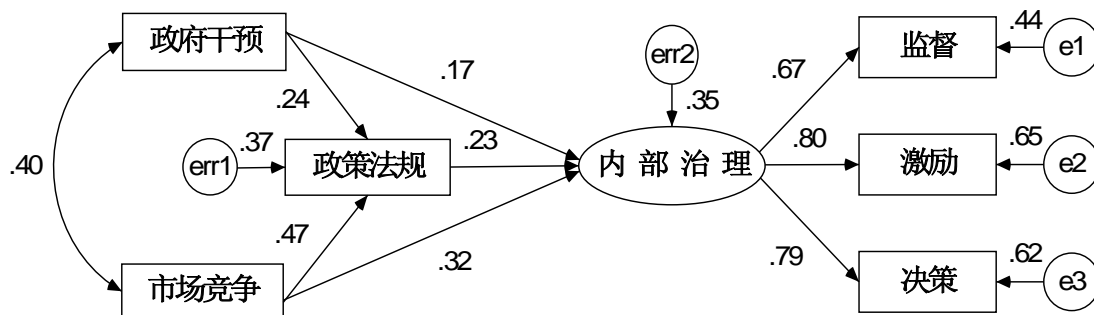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变量结构关系假设示意图

图1显示的SEM结构模型同时包括了显性变量（即观察变量，用方形表示）和潜在变量（用椭圆形表示），对这种模型的分析被称为混合SEM结构或路径分析。本文预期三个外生观察变量——政府干预、市场竞争和政策法规除了对内生潜在变量内部治理具有直接影响外，因为政府扶持及税收优惠等政府政策法规的中介效应，政府干预和市场竞争两个变量还会通过政策法规这一中间变量对内部治理具有间接影响。

2.3.2 全样本SEM结构分析

因为全体样本数据是大样本数据且符合多变量正态分布，所以本文采用Amos7.0结构方程专用分析软件的极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 ML）进行图1假设模型的适配检验，得到了理论模型各参数标准化估计解（如图2所示）。结果显示，模型整体适配情况良好。卡方值很小（6.616）且其p值等于0.358 > 0.05，表明卡方统计量不显著，从而接受虚无假设——理论模型隐含的协方差矩阵Σ与实际样本数据导出的协方差矩阵S之间没有差异。整体模型的适配度指数（GFI=0.998 > 0.90）、调整后的适配度指数（AGFI=0.995 > 0.90）和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SEA=0.009 < 0.05）均显示模型有优良的适配度，内部治理潜在变量三个测量指标（监督、激励和决策）的组合信度为0.799（>0.60），表明我们构建的假设模型可以很好地拟合样本观察数据揭示的真实情况。整体模型适配度检验摘要表（表3）显示，除了PGFI、PNFI、PCFI没有达到大于0.50的标准（表明模型的简约度欠佳）外，其他适配度指数均通过了适配标准的检验，模型各参数的估计值也都达到了0.1%的显著性水平（如表4所示）。同时也未出现大于3.84（p < 0.05）的模型修饰指标（Modification Indices, MI），模型没有叙列误差，所以就没有修正的必要。但考虑到理论模型在同一总体下不同样本企业类别间应具有结构稳定性和普适性的需要，本文随后又进行了多群组检验。



标准化解: CMIN=6.616(p=.358), DF=6, GFI=.998, AGFI=.995, RMSEA=.009

图2 全样本结构模型

表3 全样本结构模型整体模型适配度检验摘要表

	检验统计量	适配标准或临界值	检验结果数据	适配判断
绝对适配度	卡方值 (CMIN)	$p > 0.05$ (Σ 与 S 之间的差异未达显著水平)	6.616 ($p=0.358$)	是
	残差均方和平方根 (RMR)	< 0.05	0.004	是
	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 (RMSEA)	< 0.08 (若 < 0.05 优良; < 0.08 良好)	0.009 (优良)	是
	适配度指数 (GFI)	> 0.90	0.998	是
	调整后适配度指数 (AGFI)	> 0.90	0.995	是
增值适配度	规准适配指数 (NFI)	> 0.90	0.998	是
	相对适配指数 (RFI)	> 0.90	0.994	是
	增值适配指数 (IFI)	> 0.90	1.000	是
	非规准适配指数 (TLI)	> 0.90	0.999	是
	比较适配指数 (CFI)	> 0.90	1.000	是
简约适配度	简约适配度指数 (PGFI)	> 0.50	0.285	否
	调整后简约规准适配指数 (PNFI)	> 0.50	0.399	否
	调整后简约比较适配指数 (PCFI)	> 0.50	0.400	否
	临界样本数 (CN)	> 200	2692	是
	卡方自由度比 (CMIN/DF)	< 2.00	1.103	是
	Akaike 讯息效标 (AIC)	理论模型值小于独立模型值, 且同时小于饱和模型值	$36.61 < 2727.832$ $36.616 < 42.000$	是

表4 全样本结构模型参数估计显著性检验摘要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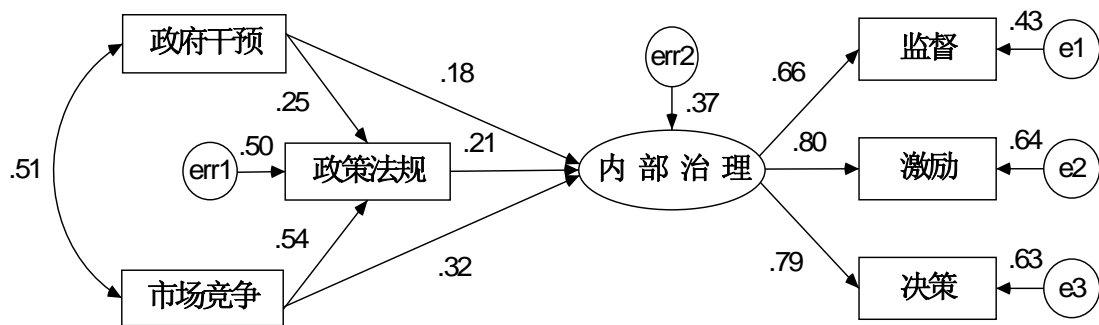
参数类别	参数代码	标准化估计值	标准误 (S. E.)	t 值 (C. R.)
因素载荷 W	W1	0.666	0.039	23.668***
	W2	0.805	0.045	23.668***
	W3	0.790	0.046	22.971***
	P1	0.174	0.019	6.038***
	P2	0.236	0.025	10.219***

路径系数 P	P3	0.322	0.021	9.818***
	P4	0.474	0.024	20.527***
	P5	0.229	0.020	7.104***
相关系数 C	C	0.404	0.014	14.092***
误差方差 V	V1	0.264	0.012	21.969***
	V2	0.132	0.009	15.534***
	V3	0.144	0.009	16.439***
	V4	0.476	0.018	26.589***
	V5	0.504	0.019	26.589***
	V6	0.341	0.013	26.589***
	V7	0.137	0.011	12.448***

(***表示在0.1%水平上双侧t检验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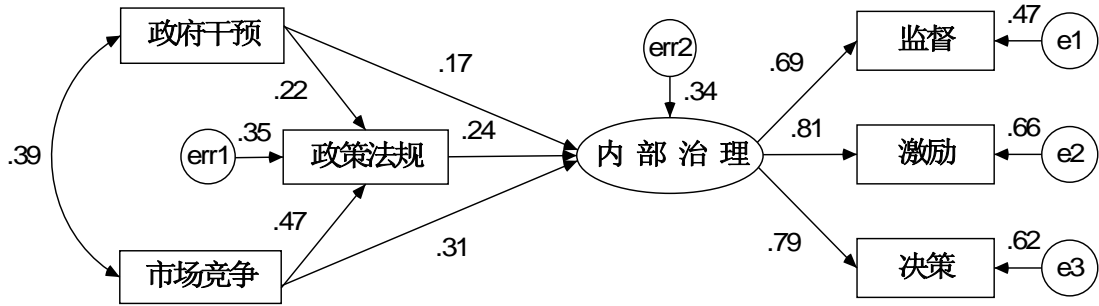
2.3.3 多群组SEM结构分析

多群组同时分析 (simultaneous analysis of several groups) 的目的在于探究适配于某一个群体的结构或路径模型图相对应的参数是否也适配于其他群体。因为企业的所有制形式或终极控制人不同, 政府、市场和法制等外部环境对内部治理的影响方式和效果也会不尽相同, 所以国内多数学者在做与本课题相关领域的研究时把上市公司分为政府控制的公司和非政府控制的公司, 如文献[4]、[5]等, 仿照他们的做法, 作者对属于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同时进行了多群组检验¹。图3、图4分别是在设定测量系数 (Measurement weights) 和结构系数 (Structural weights) 组间等同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群组的SEM结构模型输出结果, 并提供了两个群组的模型参数估计显著性检验摘要表 (表5) 和共同的整体模型适配度检验摘要表 (表6)。



标准化解: CMIN=24.391(p=.182), DF=19, GFI=.994, AGFI=.987, RMSEA=.015

图3 国有企业组结构模型



标准化解: CMIN=24.391(p=.182), DF=19, GFI=.994, AGFI=.987, RMSEA=.015

图4 私营企业组结构模型

表5 多群组结构模型参数估计显著性检验摘要表

参数类别	参数代码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标准化估计值	标准误 (S. E.)	t 值 (C. R.)	标准化估计值	标准误 (S. E.)	t 值 (C. R.)
因素载荷 W	W1	0.656	0.040	23.738***	0.688	0.044	22.079***
	W2	0.798	0.045	23.738***	0.812	0.045	23.738***
	W3	0.794	0.038	25.964***	0.791	0.042	24.223***
路径系数 P	P1	0.179	0.021	5.935***	0.175	0.023	5.579***
	P2	0.255	0.025	9.484***	0.225	0.028	8.618***
	P3	0.315	0.023	9.548***	0.295	0.024	8.517***
	P4	0.540	0.024	20.539***	0.461	0.027	17.697***
	P5	0.214	0.022	7.230***	0.258	0.023	7.423***
相关系数 C	C	0.508	0.047	6.418***	0.393	0.015	12.349***
误差方差 V	V1	0.341	0.040	8.542***	0.241	0.012	19.300***
	V2	0.135	0.029	4.629***	0.127	0.009	14.170***
	V3	0.182	0.026	6.981***	0.142	0.009	14.985***
	V4	0.591	0.059	10.018***	0.449	0.019	23.878***
	V5	0.606	0.061	10.018***	0.489	0.020	23.878***
	V6	0.259	0.026	10.018***	0.349	0.015	23.878***
	V7	0.154	0.034	4.520***	0.142	0.012	11.681***

(***表示在0.1%水平上双侧t检验显著)

表6 多群组结构模型整体模型适配度检验摘要表

	检验统计量	适配标准或临界值	检验结果数据	适配判断
绝对适配度	卡方值 (CMIN)	$p > 0.05$ (Σ 与S之间的差异未达显著水平)	24.391 ($p=0.182$)	是
	残差均方和平方根 (RMR)	< 0.05	0.016	是
	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 (RMSEA)	< 0.08 (若 < 0.05 优良; < 0.08 良好)	0.015 (优良)	是
	适配度指数 (GFI)	> 0.90	0.994	是
	调整后适配度指数 (AGFI)	> 0.90	0.987	是
增值适配度	规准适配指数 (NFI)	> 0.90	0.991	是
	相对适配指数 (RFI)	> 0.90	0.985	是
	增值适配指数 (IFI)	> 0.90	0.998	是
	非规准适配指数 (TLI)	> 0.90	0.997	是
	比较适配指数 (CFI)	> 0.90	0.998	是
简约适配度	简约适配度指数 (PGFI)	> 0.50	0.450	否
	调整后简约规准适配指数 (PNFI)	> 0.50	0.628	是
	调整后简约比较适配指数 (PCFI)	> 0.50	0.632	是
	临界样本数 (CN)	> 200	1659	是
	卡方自由度比 (CMIN/DF)	< 2.00	1.284	是
	Akaike 讯息效标 (AIC)	理论模型值小于独立模型值, 且同时小于饱和模型值	70.391 < 2674.115 < 70.391 < 84.000	是

通过对国有和私营企业两个群组模型输出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相比全样本结构模型,由于卡方值受到样本数量变化的影响,其值有所升高,使得p值降至0.182,但大于0.05,通过了适配标准检验。除PGFI简约度指标值欠佳外,其他适配度指数均通过了适配标准的检验,两组企业结构模型各参数标准化估计值也都达到了0.1%的显著性水平,理论模型的结构关系通过了复核效化 (cross-validation) 检验,即表明图3和图4所呈现的结构模型可以分别与两群组企业各自的样本数据适配,亦即表明图1所假设的变量间结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适性,不但适用于全体样本企业,而且也适用于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群体。

3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3.1 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课题组对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治理现状的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政府干预和市场竞争对企业内部治理的影响。通过对1415家企业全样本和国有企业及私营企业两个群组的结构方程路径模型的实证分析,本文得到了以下重要发现:

(1) 政府部门的干预行为及同行企业的市场竞争对企业的内部治理均有重要的正向影响(图2),从而否定了假设1,肯定了假设2。政府干预和市场竞争对内部治理的影响效应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两类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中表现不同,表7对此进行了对比。

表7 国有企业组和私营企业组结构模型影响效应对比表(标准化解)

变量关系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政府干预→内部治理	0.165	0.006	0.171	0.175	0.058	0.233
市场竞争→内部治理	0.472	0.017	0.489	0.295	0.119	0.414

(注:表7是两组企业样本数据分别独立套用图1假设模型图经适配检验后所得到的标准化估计解。两组企业结构模型共同的适配度为:CMIN=14.933(p=0.245),CMIN/DF=1.244,GFI=0.996,AGFI=0.988,RMSEA=0.014)

(2)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同行企业间的竞争环境除了对企业内部治理有直接影响外,还会通过政府对企业的政策扶持和税收优惠等政策法规这一中间变量对内部治理施加影响,从而假设3得到了通过。政策法规环境对内部治理的正向影响效应强化了政府和市场等外部因素对治理机制的影响,对私营企业来说,政策法规的这种中介效应相比国有企业更为显著。

(3)政府干预和市场竞争之间高度正相关,政府和市场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企业的内部治理。相对于政府行为和政策法规,市场竞争是影响企业内部治理最为重要的一个外部环境因素。创造一个公平、良好的行业竞争环境对企业治理机制的完善和治理水平的提高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4)至少在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干预、市场竞争以及政策法规对企业内部治理的影响路径和方式存在一个较为显著且稳定的结构关系(如图5所示),这种结构关系具有普适性,不因企业的所有制形式或企业性质的不同而不同。(图中括号内的+号表示系数为正,***号表示系数t检验的p值小于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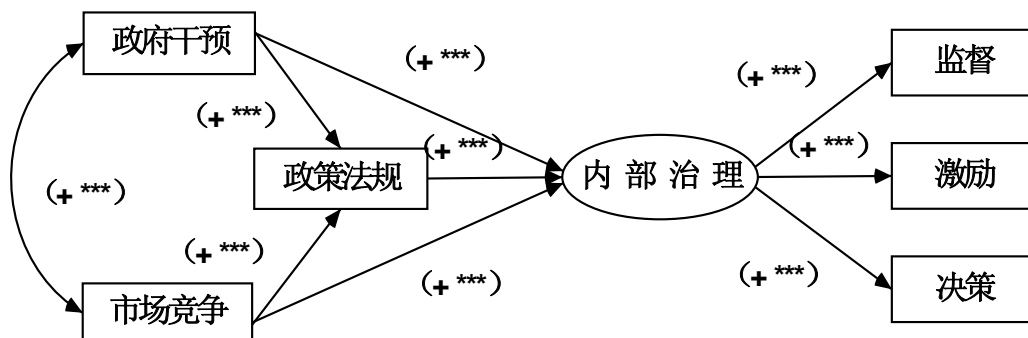


图5 政府干预、市场竞争与内部治理:结构关系模型

3.2 政策启示

本文实证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启示了我们探讨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时不仅要确定因变量对果变量影响的方向及其显著性,还要界定影响的路径和方式,即准确找出变量之间隐含

的结构关系，基于结构方程路径模型的实证研究方法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借鉴。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提高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解决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不仅需要继续“抓大放小”，还需要从根本上规范政府行为和市场秩序。对研究者来说，需要把目光转移到影响公司治理的根本因素上来，加强对政府、市场、法制等公司外部环境的分析。对企业和实务界来说，内部治理机制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外部治理环境是企业取得卓越公司治理绩效的保证，二者缺一不可。

政府干预和市场竞争的外在性使其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企业管理者的实际控制能力，由此造成了企业对所处的外部环境的改善显得无能为力，只能调整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设计以被动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这样政府和市场就需要承担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的义务。政府和市场一方面可以分别通过自身的行政干预力量和同行竞争压力直接促进企业内部治理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又都可以借助于适当的政策法规为中间手段间接促进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完善²。

无论是作为影响企业内部治理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的市场竞争环境，还是作为政府和市影响企业内部治理的间接工具的政策法规环境，二者都与政府干预因素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如表2所示），他们对企业内部治理的促进作用有赖于积极的政府干预行为，这就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出台并完善推进企业发展的有关地方法规和配套政策，引导各市场主体公平公正地参与竞争，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政府要做好股东的角色，应当对经营者充分放权让利，并施以有效的监督和激励，使经营者致力于国有企业长期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同时政府应按照市场经济法则减少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承担的非经济目标和社会职能，切实减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政府要加强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适当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积极帮助企业缓解融资难的问题，通过创造更加宽松的政府支持和服务环境来推动民营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改善，并由此促进我国民营经济的生存与发展。

4 讨论

本文用来 SEM 实证分析的数据生成于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管理人员对企业治理环境和内部治理满意度的评价结果，这种数据获取方式不同于国内学者在进行与本课题相关的实证研究时的做法，他们通常都是以我国证券市场的大中型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樊纲等推出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数为样本数据来源，这样我们的研究结果就同国内已有的研究结论出现了一些差异，主要表现在政府干预和公司治理的关系上。正如前文理论综述中指出的那样，国内已有的研究结论表明政府行为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更多的是产生负面、消极的“干扰”；而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政府也可以为企业提供一双积极的“帮助之手”，政府部门干预对企业内部治理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显著性水平平均达到了 0.1%），这种正向影响效应在民营企业内表现得更为明显。我们不能回避这一差异，下一步的研究需要更深入地探究差异产生的深层原因。另外，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本文所采用的调查问卷并不是基于结构方程建模而设计的，观察变量只是生成于问卷中个别相关题项，所以潜在变量的测量显得较为粗放，不够细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SEM 模型的内在质量和结构稳定性。

参考文献

- [1]陈信元，叶鹏飞，陈东华. 机会主义资产重组与刚性管制[J]. 经济研究，2003（5）.
- [2]Poncet S.A Fragmented China: Measure and Determinants of China's Domestic Market Disintegr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5,13(3):409~430.
- [3]李增泉，余谦，王晓坤. 掏空、支持与并购重组[J]. 经济研究，2005（1）.

- [4] 夏立军, 方轶强. 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 2005 (5): 40~51.
- [5] 周中胜. 治理环境、政府干预与大股东利益输送[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7, 29(4): 62~70.
- [6] 高雷, 宋顺林. 治理环境、治理结构与代理成本——来自国有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 经济评论, 2007(3): 35~40.
- [7] 李秀玉. 治理环境与盈余管理的地区性差异研究[J]. 东岳论丛, 2009, 30(9)
- [8] 龚朴, 严也舟. 股权集中度、董事会独立性与治理环境[J]. 管理学报, 2009, 6(10): 1347~1353.
- [9] 樊纲, 王小鲁, 张立文.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 2000 年报告[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1(3): 17~27.
- [10] 张照南, 杨兴全. 治理环境、现金持有量与公司价值——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9(2): 88~94.
- [11] 张慧敏, 陈德球. 治理环境、董事会效率与投资者关系管理[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9, 31(9): 71~78.
- [12] 李维安, 武立东. 公司治理教程[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53~63.
- [13] 吴明隆. 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1~33, 37~59, 371~433.
- [14] 邱皓政, 林碧芳. 结构方程模型的原理与应用[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9: 3~10.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Market Competition And Internal Governance:
A Structure Model**
——From the Survey Evidence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in China's Underdeveloped Regions

YU Yaodong , ZHOU Jian

(1 China Academ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Abstrac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market competition exert important influences on the Enterprise's internal governance mechanism. To some extent, these impact effects have different performance in state-owned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of different ownership forms. Government and market not only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but also influence them through the ways of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he inspiration of this article's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is the necessity to define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 and affecting patterns among causal variables; The policy implication of this article's research findings is that the problem-solving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depends on government-action-improving and market-level-advancing.

Key words: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Market Competition; Inter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Model

收稿日期: 2013-3-1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战略决策资本的企业战略治理与可持续竞争优势研究”（编号：7127218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制度转型、战略选择与竞争优势源泉研究”（编号：70872048）；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国际化战略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评价与竞争优势研究”（编号：NCET-08-0302）；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于董事会能力的企业投融资战略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1JJD630005）

¹集体企业和三资企业虽然在样本中也有所涉及，但是数量太少，不具备参与 SEM 多群组同时分析的可行性。

²这里需要注意政府对企业内部治理的直接干预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应当尽量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的直接介入，更多地为企业发展提供政策和法规上的服务职能。本文的全样本和分组结构方程模型中路径系数P1（政府干预→内部治理）均小于路径系数P2（政府干预→政策法规）印证了上述观点。